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

丛书主编：陶 坚

全球经济治理与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陶 坚◎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

丛书主编：陶 坚

全球经济治理与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陶 坚◎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 陶坚编著. —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6

(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 / 陶坚主编)

ISBN 978-7-5130-4126-3

I. ①全… II. ①陶…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②对外经济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F11
②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232号

内容提要

本书以全球经济治理的大时代为背景, 分析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涉及的多领域、多层次议题。上篇, 着眼于找规律, 启发思考。作者对全球治理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 揭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关系, 并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了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接着, 以二十国集团、欧盟、东亚地区、美国为例, 从不同角度切入, 探讨了各自的政策和实践、对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下篇, 立足于谋对策, 紧扣中国。作者围绕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角色、现状和能力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 中美经贸不平衡关系的治理, 对美欧贸易协作的应对, 以及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提出了全面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系统、有见地、可行的政策建议。

策划编辑: 蔡虹

责任编辑: 李瑾 杨晓红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封面设计: 邵建文

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陶坚 编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92

责 编 邮 箱: lijin.cn@163.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ISBN 978-7-5130-4126-3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以下呈现给读者的,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师生的最新作品。它们是国际经济系课题组承担的“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取名为“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丛书”,共5种。

全球治理与中国,是贯穿这项课题研究的一条主线,一个既宏大、长远,又具体、直接关系到世界进步、国家繁荣和企业发展的问題。

陶坚教授主编、十多位老师和同学协力完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一书,以全球经济治理的大时代为背景,展开分析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涉及的多领域、多层面议题。上篇,着眼于找规律,启发思考。作者对全球治理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关系,并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了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接着,以二十国集团、欧盟、东亚地区、美国为例,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了各自的政策和实践、对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下篇,立足于谋对策,紧扣中国。作者围绕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角色、现状和能力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中美经贸不平衡关系的治理,对美欧贸易协作的应对,以及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出了全面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系统、有见地、可行的政策建议。

张士铨教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在全球化和转型两个大背景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面对着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处理增进国家经济利益和现有全球公共物品的相互关系。虽然它们都是现实存在并有多样化的表现方式,也是当今我国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获取国家利益,在此

基础上谋求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和发挥国际影响力的着力点所在，但为什么这样做，很多人尤其是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不甚了解。所以，他在专著《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公共物品》中，以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方法，依次对国家面对的利益格局调整、国家利益的获得以及它们和全球利益的博弈关系，对国内公共物品和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和面对的矛盾逐一展开分析，并提出了精辟观点：第一，国家利益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取决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组合既超越了国界限制也打破了意识形态束缚；第二，增进一国的国家利益，必须说明并夯实各方的利益基础，否则国家利益就是空谈，无法实现；第三，国家利益有其内在结构，在一定外在环境下各种利益之间存在互补与替代关系，优先发展经济利益是取得国家利益的关键；第四，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利益格局和公共物品的供需关系。在国家实力提升、更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硬公共物品”为先导，逐渐对“软公共物品”发力，促进我国利益与全球利益融合，提升我国的全球影响力。

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领域。史亚东博士在《全球环境治理与我国的资源环境安全研究》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主体、原则和政策工具，结合我国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现状，对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对于我国资源环境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她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探讨了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未来的改进方向，以及对我国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影响，还具体分析了节能减排约束下我国能源价格风险和能源效率问题。

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格局，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不断加快，推动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全球各地地区的迅速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刘中伟博士的专著《东亚区域服务贸易

自由化合作发展机制研究》，在总结借鉴服务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东亚区域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研究东亚区域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发展机制和区域经济治理问题，并就中国参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合作进程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一是通过回顾全球和东亚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对东亚地区服务贸易总体状况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点与趋势进行了阐述。二是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理论分析的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在提高经济效率、形成贸易效应方面的作用在服务贸易领域同样适用，并对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积极作用明显。三是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发展，一方面在于各经济体自身的服务业发展，服务生产要素资源在产业内的整合、互补和投入程度，具备开展服务贸易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东亚各经济体要具有开展合作的意愿，并通过寻求签订服务贸易合作协议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四是在全球价值链整合和服务业跨境转移背景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对东亚区域服务贸易体系和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构建有利于东亚地区长远发展的稳定、平衡的合作与治理机制，将最终成为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实现的制度保障。五是中国在参与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可以立足于比较优势 and 专业化分工深化，改善自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大力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加快促进服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把握东亚服务贸易自由化合作进程重点，注重合作与治理机制整合发展；建立健全服务贸易政策体系，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据此，作者指出，当前东亚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主要通过其共享机制、开放机制、竞合机制和经济增长机制四种机制，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体深入开展服务贸易合作，完善区域开放性经济一体化和治理机制建设，促进东亚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刘斌博士的《21世纪跨国公司新论：行为、路径与影响力》，重点围

绕跨国公司的经济属性、管理属性和政治属性的“三维属性”，从一个整合的层面，结合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对其中的七大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全书通过对跨国公司的产业行为、经营行为、战略行为、组织行为、创新行为、垄断行为、主权行为进行纵向历史性总结分析，阐述了在相关领域内跨国公司行为的特点、模式、路径，以及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分析了21世纪以来的10多年间跨国公司在相关领域行为的新动向。本书将中国跨国公司的行为特点和发展现状视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分别在相关的章节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希望由此描绘一个对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分析的完整视图。

相信上述5部著作能够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靠什么来维护国家利益，又如何扩大全球影响力。

作者们将收获的，是学术发表的喜悦和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的荣耀。

是为序。

陶坚（国际关系学院校长）

2015年7月16日于坡上村

中国“融入”和“塑造”国际体系是一个长期进程^①

陶 坚

中国正在从“适应性融入”迈向“建设性塑造”国际体系。现在看来，从“融入”到“塑造”不会是简单的阶段转换，更有可能的是两者长期并行、互为促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扩大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行动都表明，中国“适应性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还会继续，而且步伐加快，水平提高；同时，“建设性塑造”国际体系的力度也在加大，影响力上升。从这个角度观察，似有助于把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机理和国际秩序演进的未来趋势。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参与国际活动的主体所遵循的规则，保障这些规则实施所需要的机制，以及这些规则和机制所决定的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愿望之所以强烈，源于对国际旧秩序不公正、不合理本质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识。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

^① 原文发表于《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略有改动。

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并以此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务实地选择了“适应性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对内坚持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对外坚持开放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对中国可行，对世界有利。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加深了对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了解，尤其是国际秩序有利于世界稳定与发展的积极一面。如果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制度运转良好，会保障国际经济政治活动有序开展；反之，则可能出现无序、失序的混乱状态，甚至爆发国际冲突乃至战争。

基于这样的理解，将现有秩序完全推倒重来，从未进入过中国战略决策者的理性选择视野。即使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迅速壮大了实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自己却没有变成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相反，随着综合实力和大国地位的上升，中国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问题缺陷和解决出路思考趋于深刻，对国际秩序失序、无序的担忧加重，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热情上升。比如，党的十六大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国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从逻辑上看，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塑造”，是“适应性融入”的必然结果。

也正是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当中,中国的自我认识和定位趋于清晰准确。习近平同志早在2012年就表示,“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并多次提到了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建设性作用”和“建设性参与”。^①他又指出,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个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他提醒国人,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②可以说,做一个负责任大国,推进全球治理、引领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内生要求。中国不仅在考虑如何改变国际秩序以对我有利,而且关注如何改革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以有益于全世界;不仅用增强实力、创新理论等来为改变世界做准备,而且做好了进一步改变自身以顺应世界潮流变化的心理和舆论准备。适应性和建设性,是理解崛起的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之间关系性质的一把钥匙。

二

日益强大的中国必然追求更多的话语权、更大的影响力。为了推动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中国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倡议,比如和谐世界、和谐亚洲、“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等等,而且辅之以有力的落实措施,比如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2016年中国还将主办G20峰会,力图在全球治理领域占据制高点。中国的新理念、新倡议引人瞩目,具体的行动举措更为外界所重视。加强全球治理、塑造国际秩序的积极行动,如何让外界理解接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7/07/c_112383083_2.htm.

② http://news.gmw.cn/2015-10/14/content_17336049.htm.

受而不是疑虑抵触，已是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课题，需要我们真正像世界大国一样展开全球视野，包容各方利益，用行动的力量来树立权威，用榜样的力量号召和吸引跟随者。

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建设性塑造，离不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和邻国的回应和互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营造积极信任的氛围，重点是在主要大国之间倡导对话、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摒弃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尊重各自利益，加强协调合作，培育各方的“积极信任”。

“积极信任”既是双向、开放、平等对话的产物，又是对话得以持续和升级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存体系的主导大国美国与崛起大国中国之间，更离不开这种“积极信任”。为此，中国应明确自身定位，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增强“大国自信”，又绝不“妄自尊大”。各个大国则应认真反思，变“回应来自中国的强大挑战”为“包容和接纳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并实质性地调整自己。这里特别要指出，美国已经到了切实改变自己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时候了。

不可否认，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的行为方式有着巨大制约，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的行为也有力地反作用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国体量大，现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大型经济体，即便是“适应性融入”的行动，也会对国际体系和规则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比如加入WTO后的情况就是如此，更何况近些年来中国试图重塑地区和国际体系的主动行动了。所以说，摆脱“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权力转移产生的战略困境，避免出现零和局面，管控好冲突，尤显重要。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字，精髓在于此。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由于中国“融入”与“塑造”阶段的长期并行，所以不太容易辨识中国的行为到底属于应战还是挑战，因而出现战略

上的犹疑和策略上的混乱或不连贯,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他们与中国相处和化解矛盾的弹性空间和转圜余地扩大。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国际秩序的“平等”只能在动态中实现,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新兴大国应致力于在动态中追求平等、体现平等,逐步加强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扩大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以及对国际重大事务的话语权。西方大国也将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逐步接纳和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尽管会很痛苦。不管怎样,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适应性和建设性导向,使得现存体系中的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完全有可能,也有动力采取包容的方式对待中国。

三

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西方国家的“集体性衰落”,是“二战”结束以后从未出现过的格局变化,势必推动国际秩序大调整。当下我们讨论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不能脱离这一大背景,中国只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崛起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秩序都更为成熟、完整的国际秩序。新兴国家若游离于这套秩序之外,必会被边缘化;若另起炉灶建立新制度,代价昂贵;若融入其中,则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这套不平等秩序的存续,也为改革增加了难度。制度一旦形成,制度的参与方就会产生“路径依赖”,进而会维持这种制度的存在,让制度更具稳定性。以国际经济秩序为例,“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虽有所调整,并且参与国家越来越多,但其本质没有变化,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发达国家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体系,以及由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

货币金融体系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①

国际秩序影响和支配着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表现和利益分配。因此，阻挠国际秩序变革的强大势力，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他们利用实力优势，抵制和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主张和要求，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不肯做出让步和妥协。发达国家竭力维护的核心是制度与规则，包括旧规则的修订权、新规则的制定权，比如2015年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拉开了经贸领域“规则之争”的大幕。更为重要的是，这股阻挠国际秩序变革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形成合力。比如美欧之间有着深度的利益捆绑，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的进展可见一斑。

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阻挠，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自然就不应以一国之力去改变整个国际体系。只有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才能应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制度惯性问题；只有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才能解决好新兴国家崛起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推动国际秩序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但由于国家数量多、分布广、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各异，尚未形成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金砖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承载着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和共识的使命，而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联合自强，一直是中国致力追求的目标。

四

回顾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叶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包括中国在内

^① 张伯里：《当代世界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297页。

的新兴大国国力的非均衡性，与其实力增长速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上升势头最快，发展也最不平衡。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到“十三五”规划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理念的提出，反证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失衡和不可持续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国力的非均衡性和不平衡发展还会存在，新兴国家都面临补强自身力量的共同任务。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塑造，本意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立体化的，而在初期的较长时间里，核心在经济，表现为经济实力、经济影响力和经济话语权。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强大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巨大的经济成功，又创造了重塑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这充分说明经济力量对于崛起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当前，中国正受到经济改革模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经济脆弱性加重。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讨论中国的大国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时，已不能把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当作既定的前提了。开始“建设性塑造”国际秩序的中国，仍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补强自身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国家，壮大了的中国面临着维护现有优势和建立新优势的艰巨挑战，战略机遇期里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发展。

国力的非均衡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制约着中国塑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与成效。力量非均衡性长期存在，决定了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多样、多变的。西方大国对中国国力性质的复杂性，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战略意图的可信度，时常产生过高或过低的判断，比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中国力量结构的上述特点，亦使得西方挤压中国发展空间、扰乱中国发展进程的诱惑巨大。美国方面曾称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关系”，而双方力量性质上的差别则是这一“复杂性”的重要根源。尽管中国经济实力显示出快速追赶美国的势头，但两国国力

的完整性仍有质的差别——美国的国力结构比较均衡而中国极不平衡。美国仍是世界主导国家，不光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中国，在科技和军事上的领先优势更大，且经济的修复力和社会的活力都很强。这一差距决定了中美两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落差将继续存在，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仍是相对有限的。

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此时此刻，快速崛起的中国会对现存国际体系采取何种行动，施加何种影响，把变革引向何方，就成了一个为世人关心的大事。中国挺立于国际秩序变革的潮头，是当今时代所造就，又将影响这个时代。如何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涉及目标设定、能力建设以及使用力量的意志、采取的方式方法等，这些都是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的回应将是，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塑造国际秩序，在塑造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更加完善自己。

上篇 分析与启发

第一章 “全球治理”理论简述及“自治性”构思	3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理论概述——导言	4
第二节 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基础	15
第三节 全球治理简论	32
第四节 从G7到G20——全球治理的典型模式	44
第五节 全球治理的根本在于“善治”	47
第六节 全球治理的理论思考	54
第七节 全球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	68
第二章 国际经济秩序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71
第一节 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演变	71
第二节 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	78
第三节 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与全球经济治理发展的内在关系	87
第四节 国际经济秩序改革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前景	94
第三章 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	99
第一节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99
第二节 全球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治理	105

第三节	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减排责任	112
第四章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	120
第一节	既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滞后性	120
第二节	二十国集团的形成	123
第三节	二十国集团的演进	126
第四节	二十国集团演进路径的不确定性	135
第五节	美国的二十国集团战略剖析	138
第六节	中国参与二十国集团治理的战略	142
第五章	欧盟影响力与全球经济治理	152
第一节	欧盟影响力的基本内涵	152
第二节	欧盟影响力的主要表现	154
第三节	欧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理念	160
第四节	欧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影响力的制约	165
第五节	结语	168
第六章	东亚地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170
第一节	东亚地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分析	170
第二节	东亚地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演变	174
第三节	东亚地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形式	177
第四节	东亚地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启示	188
第七章	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看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194
第一节	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内涵及其背景	194
第二节	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199